

■新作聚焦

龙一长篇小说《地球省》:

面对未来,我们担忧什么

□刘慈欣

科幻小说是创造想象世界的文学体裁,如同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形象鲜明的人物画廊一样,科幻小说则创造了形态各异的想象世界。除了个别例外,科幻小说的世界中都是有人类存在的,所以,也可以说科幻小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想象中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大多运行在未来时空中的高技术的背景之下。而龙一在《地球省》中所创造的未来社会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看科幻文学中未来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对电影《星球大战》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说它“用三千年后的技术讲述三千年之前的故事”,其实,这在科幻文学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科幻小说中所表现的未来社会,其社会形态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进步,相反却退回到现代社会之前落后的形态中,我们不妨把这称为科幻小说中的“社会返祖现象”。

这些落后的未来社会大都可以在人类历史上找到对应体,比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很像银河系尺度上的罗马帝国,郝伯特的《沙丘》系列是阿拉伯沙漠帝国在遥远外星的再现,而海因莱因相当一部分作品中的社会体制都有明显的军国主义色彩。另外一些科幻未来社会中,其落后的政治形态被高技术所放大,形成了比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形态更加黑暗的未来社会,如同噩梦,这类典型的作品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等。而由现代民主社会合理延伸到未来的社会形态在科幻小说中反而是少数,阿瑟·克拉克的作品大多有这样的未来民主社会背景。

说《地球省》独一无二,是因为它的社会返祖如此彻底和决绝,至少我自己没有在之前的科幻小说中见到过。《地球省》展现的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未来版,其他上世界是清末形态的,地下世界则更接近民国初年。虽然这个想象世界中存在着许多未来因素,如能够限制个体寿命的植入装置、星际航行和外星文明等,但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找不到未来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个社会的灵魂是清末民初的,这个世界中的人,似乎没有经历过技术时代的洗礼,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他们对皇权的态度,都停留在陈旧时代,而其泛黄的中国市井色彩,使我们瞥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样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陈旧社会在未来复活,与高技术的背景进行了奇妙的融合,最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融合保留了厚重的中

国世俗文化色彩,这使得《地球省》中的地球像一颗滋味浓郁的怪味豆,让人回味无穷。

对于科幻文学中社会返祖现象的原因,一种通行的说法是:科幻作家把想象中黑暗的未来作为一种警示,以努力使这样的黑暗最终不会成为现实。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确实有一些以警示为目的的反乌托邦作品,典型的如奥威尔的《1984》,但这类作品在科幻文学中只是少数,且都处于边缘地位,对于大部分科幻小说来说,社会返祖现象却是基于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因。美好的社会固然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但在科幻小说中,没有比完美社会更乏味的东西了,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世界设定中能产生吸引人的故事,震撼的故事所需要的矛盾冲突只能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出现。

《地球省》正是借助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构建了一个精彩的未来史诗。从主人公由一个底层人物成长为救世主的艰险历程,全景式地从地下、地面和太空三个层面,描述了已经沦为外星饲养场的地球世界的惊心动魄的变迁,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值得一提的是《地球省》中的人物,从社会底层的警察和酒吧女到皇帝和外星大使,都有鲜明的性格形象,这在国内的科幻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在增强科幻小说的文学性方面,《地球省》无疑是一部突破性的作品。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科幻小说并非是预测性的文学,而是可能性的文学,它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至于预测这众多可能性中哪些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不是科幻小说能够做到的,也不是它的任务。事实上,科幻作家很少去关注作品中的预测性,更多关注的是从可能性中提取故事资源,所以,他们所关注的往往都是那些看似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想象。但事实证明,恰恰是这类看似不可能的预测后来真的成为现实。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科幻小说中的社会返祖现象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单向性,世界在不断进步和更新着,过去的一切像沙滩上的印记,被文明发展的大潮无情地永远抹去,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形态似乎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但在未来,这种可能性真的为零吗?

首先,先进的现代技术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是在一定程度上融

合的,现在那些仍处于封建体制下的中东石油帝国就是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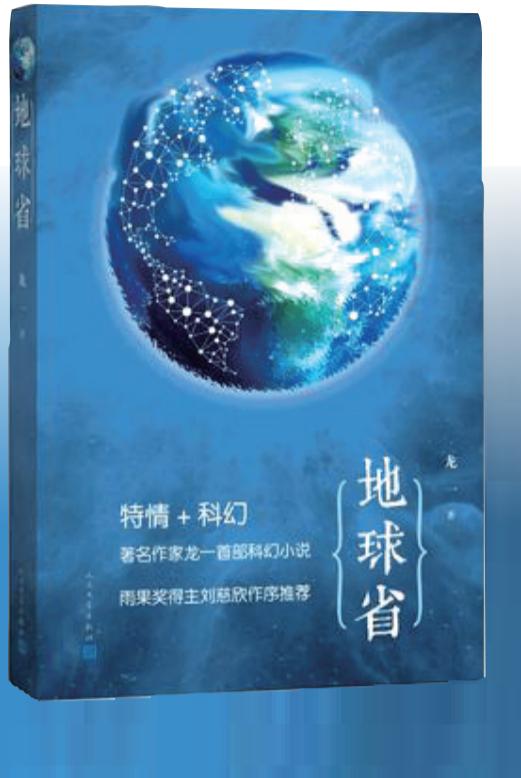
未来的社会返祖如果真的发生,一定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某些外部和内部灾变所致。

外部灾变最有可能的是地球环境的恶化,生存的资源急剧减少,人类社会必须改变形态才能延续下去。

另一种社会返祖可能在太空中发生,太空中充满着艰险和未知,当人类进入太空开拓新世界时,地球上的舒适和平静将荡然无存,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种种难以想象的挑战,已经成为遥远历史的艰险的生活将重新出现。

在新的太空大航海时代,许多在地球文明世界已经和正在消失的东西,将重新出现甚至成为文明的主流。这是一个沉重而深刻的问题: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经历过的,还会在太空中重来一次吗?

另一种社会返祖的动因可能来自人类文明内部,最大的可能性当然是技术的进步。从历史上看,技术的发展都是在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工业革命使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为民主革命和变革提供了动力;出版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启



迪了民智,使民主思想广为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技术的发展使文艺复兴中人文的阳光照亮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使个人直接向全社会发表意愿和诉求成为现实。但另一种力量正在孕育,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将国家机器变成一部真正的机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机器,这将是绝对稳定的系统,如果被独裁者控制,也将对其绝对忠诚。

同时,由于AI网络几乎拥有无限的精力,可以对每一个社会个体进行完全的监视和控制,这就为社会返祖提供了技术基础。

社会返祖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上述内部和外部因素同时发生作用,而这正是《地球省》中所描述的状况,地球环境的恶化、外星文明的入侵、可能从生理上控制所有个体的生物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清末初社会在未来的复活。

科幻小说总是不断产生着形形色色想象中的未来世界,而《地球省》所创造的未来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一一个,让我们在惊异的阅读体验中从未来回味历史,从历史想象未来。

■创作谈

我开始设计《地球省》的故事的时候,某行业巨头刚刚宣称:“大数据是未来的货币。”这个说法因其高科技前提而显得颇为委婉,如果翻译成白话,即“大数据就是钱”。关于数据具有价值潜力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然而,这个“宣称”之下的潜台词,因为太过明显,反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潜台词就是那个极为古老的观点:“金钱即权力”。

好吧,携多年学习与思考所得,我就讲一个“金钱即权力”的故事,设计一个“金钱即权力”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然后再尝试打破它,于是,便有了这部小说《地球省》。

在《地球省》的世界,科学技术为金钱插上了翅膀,对个体人类的关注无所不用其极,即使你放个屁也会被自动扣除税款。

《地球省》的“省教”是“钱神教”,其教义的核心是“没占便宜就是吃亏”的全部复杂与微妙的含义。

既然如此,这个社会的主人到底是谁?平头小民从思想上到生活上该当如何自处?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点也不难揣测,因为人类一直生活在与其相似的社会环境当中,只不过它没能借助生物科技控制到个体的人类,造成如此的极端化境况而已。

故事是对生活的隐喻,当代科幻小说家对于未来世界的推测,往往带有深刻的“杞人忧天”式特征,而不是像儒勒·凡尔纳那样为工业革命欢欣鼓舞,在小说中精细描绘知识与科学对人类社会的伟大作用与美妙图景。

毕竟,一百多年前那个乐观的蒸汽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五六十年前那个被世界经济大繁荣与核冷战危局双向挤压、研磨,并由此放纵个性、解放身体、解构思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久前那个被人工智能短暂地吓了一跳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时至今日,各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制度被捆绑在一起,同时达到了世界历史的某一个高点,甚至是已有历史的最高点,不变革不行了。

今年、明年,或者未来几年,人类世界将如何选择?面前的道路千万条,我们选择哪条路才不会在几十年之内出现大错误?对于选择与未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憧憬与勇气,与此同时,对于选择与未来,我们的心中也充满了恐惧与畏缩。

这一次绝不像大航海时期那样,我们恐惧未知。不,这一次,我们恐惧的是我们自身。

真正的恐惧来源于自身

□龙一

■新作快评 刘汀中篇小说《早饭吃什么》,《大家》2018年第2期

那些年吃过的煎饼与生活哲学

□李振

中关村、跳槽、大同小异的午饭、微信群里永远不能兑现的“啥时候聚聚”……刘汀的《早饭吃什么》仿佛一上来就摆出了一副中年危机的架势。小说里,小李子对眼下所得凭空生出了某种怀疑:所谓江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好在“价格是整个世界对商品的判断”,一切也就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刘汀于此虚晃一枪,转而进入了小李子的发家史,其实这是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挂了起来。

小李子的创业并不那么“艰辛”,作者也无心用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来为难为谁——这反而很巧妙地避开了很多作品里常见的“艰辛病”,天灾人祸,总是活不出个头绪,往往让人觉得要命的不是生活之难而是作家的矫情。小李子的创业说不出来不那么好听,毕竟从世界五百强跳出来开个早点摊总是让人觉得跟“理想”无关,跟“创业”无关,就连他自己也“时刻小心翼翼地怕说漏了嘴”。可小李子偏偏就在这件事儿上跟自己赌咒发誓,只为“做出最好吃的灌饼和煎饼”。在此,小说努力地排除某种情怀的干扰,它让小李子对灌饼和煎饼的痴迷与挑剔更多地集中在“经济状况”和“口味”上。他像做市场调查一般默默品评着上班路上的各个早点摊,对行业状况切实的判断和对日常经验的忠诚至少在那个时候成了小李子创业的立足之本。小说在这里做足了铺垫,或者说为之后的故事设下了足够的圈套,因为在小李子创业成功的时候,最初的那种疑惑又诡异一闪,“说像做梦又夸张了些,和宿醉有点类似,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可自己看上去摸上去老是隔着一薄薄的什么东西”。这层薄膜到最后也没有戳破,但它却十分明确地,或者说在作者的叙述中忍不住地要出来提醒人们某种东西的真实存在。这朦胧的、神秘的忧虑和焦灼始终笼罩着小说,又与人物身上被不断强调的现实感和经验性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张力。

《早饭吃什么》显然不是要讲述一个人成功创业的宝贵经验,相反,因为这种奇怪张力的存在,使人们的目光停留在创业或日常生活经验中,情感却悄然引向某个经验之外的地方,它在小李子的创业史和情感历程上明修栈道,却于那种颇为模糊的情绪里暗渡陈仓。这种相互牵扯、相互勾连又相互奋力挣脱的内在力量无疑为小说争得了大片的“自留地”,而这片“自留地”将被创业之外的故事填满。

小李子和水仙的相遇纯属偶然。但两次偶然之间,身份已经改变,嫖客成了小吃连锁的老板,小姐成了煎饼摊主。在小李子和水仙之间,还隔着一个体育学院的姑娘。小李子百般追求“体育女孩”而不得,也就有了向水仙求教的片段。因为有着小姐和嫖客这层关系,两人既

放肆又有所保留,小说把这种看似暧昧但心里又坚定地筑起堡垒的状态写得十分精细。从开始无所顾忌的玩笑到后来小李子的沉默,再到水仙“我不能欠你”的作为,无一不是在强化二人心里那种不甘却又坚定的拒绝。在“体育女孩”那里,小李子有他看重的东西。这或为虚荣,或为征服的成就感,或为对水仙此前经历的顾忌……种种原因让小李子无心也不愿去面对那种“早年吃过的煎饼”式的情感。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小李子颇费心机把“体育女孩”带入酒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行了。与此同时,对小李子的计划完全知情的水仙变得六神无主,酸楚、恼怒、自嘲和无力,在水仙心里逐一滑过。

之后的事故和由此引发的水仙出租房里粗暴又纠结的一幕,使此前所有遮遮掩掩的情绪都迸发出来。一方面是他们对各自内心长久存在却又始终回避的情感的确认,一方面又是佯装理性的大撤退。就在水仙意识到“也许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等的人”时,小李子也发现水仙的存在完全契合了他对家的想象。可是,水仙也意识到了自己跟小李子在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而小李子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既想让水仙一直陪在自己身边,又不想正儿八经地娶了她”。那么,无论是水仙要返回乡下去兑现当年的娃娃亲,还是小李子最终认定“赚钱还是重要的”,都成了某种充满绝望或自我毁灭式的“理性选择”。正如小说最终也不可能摆出什么明确的结果,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道无解之题,即便有解,答案也不在备选项。

《早饭吃什么》以非常细腻又神秘的方式写出了生活中的不真实感,这也算是对最初那个被悬置起来的问题的回答。在这一过程中,小说通过人物内心不断强调的现实因素被一点点解构,就像小李子在最初不断寻找完美的煎饼是基于“口味”而不是“情怀”,可到头来却发现“你再不可能找到那个地方,也再不可能尝到那一天的味道了”。那么,这非但不是“口味”,也不仅仅是“情怀”,而是无法扭转的时间与境遇,是宿命般无法抗拒、即便重新来过也会如此选择的遗憾和悲伤,或许这也就构成了那些“不真实”的来源。从这个角度讲,水仙之于小李子就像那个只存在记忆里却永远无法找到的煎饼,只不过她不仅一次地出现,但结果却并不发生什么改变。

刘汀用日常生活里最普遍的“早饭吃什么”演绎出一则颇具哲思的故事,它不是某种原理上的剥皮见骨,而是在具体的、细微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情绪与情怀里去发现、认识乃至坦然接受一种即在的处境,尽管它可能始终无法摆脱某种隐隐的不甘,但它于小说、于现实,都不是无力的。

■评论

面对经济时代的新文学思维

——读丁力的《中国式股东》 □贺绍俊

丁力很会讲故事,所以他的小说非常好读。他讲故事很在意故事的内在逻辑,这大概与他曾是一名理工男有些关系。有人认为文学是形象思维,凭的是丰富的感性和想象力;科学是逻辑思维,凭的是严谨的推理。其实,科学研究同样不乏想象力,只是科学的想象力不是像文学的想象力那样最终结出艺术的果实,科学想象力是科学家为发现真理而开通的一条隧道。丁力曾在科学研究中培育和磨砺过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具有一种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当他转向文学创作时,想象力虽然改变了目标,但对逻辑和因果的无限追问性这一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他讲述故事特别注重内在逻辑的主要原因。

但丁力并非仅仅是一位会讲故事的作家,我们不要忽略他所讲述的故事绝大多数都与经济活动有关。正是从这一点我们才能发现丁力的小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以革命为中心,养成了一套革命思维的习惯。这也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主流,以及革命思维的主题表达。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以革命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型,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我们能够在当代小说中看到新现实的人物和场景,但坦率地说,不少作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革命时代,以革命思维来处理经济建设的新现实,尽管这样的主题表达有其警示性,但显然它很难准确把握新现实,更难以揭示出新现实之新在何处。丁力作为一名经济建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有着切身体验,也能自觉对其进行认真思考,他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进了小说之中,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学思维方式。

《中国式股东》的故事发生在深圳这一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主人公吴治平曾经是当地龙头企业高管,即使退休了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原来在工作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位供货方老板林中对他毕恭毕敬,吴治平很享受这样的恭维,便主动参与到他的企业经营中,林中非常感激吴治平的帮助,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挽留,给予吴治平股东的权力和威望,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股东”。这种“中国式股东”是怎么维持的,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作者以层层剥茧的方式清晰明了地讲述了出来。我非常在意《中国式股东》显示的专业性,因为这表明了小说完全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仅可以相信作者对生活的书写是有真实依据的,而且也可以相信作者在小说中表达的思想发现也是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的。

我更看重丁力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的一种新的文学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种新的文学思维方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小说自然绕不开经济的话题。在《中国式股东》里,丁力以客观和

理性的态度对待股份、资本、金钱等这些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当这些元素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运行时,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这些元素对于人的影响,既有激发奋进的一面,也有引诱堕落的一面。小说中的吴治平也好,林中也好,在资本运作的过程中受到利益的诱惑,但他们多半会止步于踏向危险的境遇。这并不是他们本性善良,而是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会形成各种牵制力,遏制他们的恶念扩张膨胀。这种牵制力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理性判断,也包括了合作者的相互制衡。小说并不回避“商场即战场”这一残酷的事实,也不断地酝酿出一场场恶战,但最终都是惊险而险,这就是因为在多种因素的制衡下,局面最终得以控制。

最惊险的一场发生在小说结尾。林中的小心计玩得有些大,但未曾想吴治平与付安琪成为了夫妻,两个人的智慧汇合在一起,对资本运作的内幕看得更加透彻。他们共同敲打林中,让林中止了恶念,同时也夯实了继续合作的基础。在他们的敲打下,林中流出了眼泪。小说写道,林中的眼泪不知是“真被感动了,还是被吓着了”。感动是因为正常的情感还在起作用,吓着是因为正常的理性还在起作用。

说到底,丁力是在写人,这才是小说家最根本的职责。在《中国式股东》里,丁力所写的是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去做人,以及做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吴治平显然深懂得做人的真谛,这是他长期浸染在商界修炼磨砺出来的品质。丁力借吴治平之口说:“关键是做人。尤其是做老板,更是做人。”但仅仅将做人当成一种技巧,就会演变为心计。林中就是一个过于玩心计的人,这既说明他有足够高的智商,同时也说明他缺少真诚和胸怀。小说写的是吴治平与林中合作的故事,而从这个合作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吴治平如何以自己的做人方式影响、帮助了林中一步步提高自己的自我纠错能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胸怀。吴治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反省的姿态,因此他会说做出人最关键的是“换位思考”这样充满哲理性的活话。小说中有不少警句格言式的话,这些话可以说是作者对人生智慧的高度总结。这样的总结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也适用于普遍的人生。

商界的活动步步都与利益相关,竞争激烈时甚至性命攸关,但丁力的着力点放在做人上,也就是放在人性和人生上。他并不认为资本、股份、金钱等是可恶可怕的东西。丁力的小说中不乏批判性,只是他要把造成恶与罪孽的原因辨析得更清楚:责任并不在资本、股份、金钱本身,而在掌控这些东西的人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法则上。在经济活动中,人性中的善与恶都在进行积极的表演,作家不仅要从中发现恶,也要从中发现善,更要由此告诉人们,怎样才能让善在现实中得到最大的张扬。